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4.06.007

处所意识与家园流动性

——以古尔纳的《海边》为例

李蒙蒙,吴玲英

(中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海边》(*By the Sea*)是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古尔纳的代表作,以萨利赫和拉蒂夫两位主要人物的人生经历为线索进行双重叙事,涉及大量空间转换,尤其围绕家园流动性。古尔纳借助对家宅和庇护所等物理空间的刻画,展现了古尔纳对“家”与“归家”的复杂情感,强调“家”对于流离失所的“边缘人”的美学价值;作家对桑给巴尔历史的社会空间的动态描绘反映了非洲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打破了受众对非洲社会的刻板印象,反思了现代民族国家运动史;其对英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之刻画,旨在表明流散群体在移民国的心理空间体验。古尔纳通过绘制家园的流动性,折射出欧洲普遍存在对“他者”文化的排斥,也展现了异乡人的“处所意识”和“身份焦虑”,揭示文化与地缘裂隙间的“夹心人”的境遇与命运。

关键词:古尔纳;《海边》;家园流动性;处所意识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4)06-0052-08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1946—)是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代表小说《海边》(*By the Sea*)2001年一经发表便入围布克奖和《洛杉矶时报》图书奖两项殊荣。小说以主要人物萨利赫·奥马尔(Saleh Omar)和拉蒂夫·马哈茂德(Latif Mahmud)的人生经历为线,在讲述个体经历及追溯家族过往中书写桑给巴尔地区的殖民历史、桑给巴尔独立革命以及小说家在英国的人生体验与感悟。古尔纳本人对文学创作与空间的关系深有研究,并在小说《海边》中结合他本人从非洲到欧洲的求学以及在英国工作的经历,思考了流动性对于创作与人生的影响。本文围绕“家园”主题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何为家园的流动性?《海边》中家园流动性的表征为何?《海边》中家园流动性隐藏着作者何种意图?海德格尔曾给“家园”下过定义:“在这里,‘家园’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惟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有

要素中存在”^①。这暗示家园一方面是物理居所,而另一方面多是精神居所,涉及“家宅”“家庭”“家族”“国家”等。小说《海边》中的叙事正是描写流散群体寻找家园、回归家园之旅,实质上即寻根之旅,是探求自我在世界上的位置之旅。

一 从“家”到“非家”的物理空间:情感的流动

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认为“家宅在自然的风暴和人生的风暴中保卫着人。它既是身体又是灵魂,它是人类最早的世界”^②。家宅既帮助人们抵御外部的恶劣环境,也帮助人们聚集各种社会关系和情感。在小说《海边》中,“home”一词共出现81次,而“house”一词出现233次,因此家宅不仅仅是故事的背景,而且是叙事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小说中主要涉及两处家宅,拉蒂夫回忆童年的家宅,“我们家的房子有两

收稿日期:2024-04-21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7WTC10)

作者简介:李蒙蒙(1992—),女,河南郑州人,博士生,主要从事英语文学与文化研究。

①马丁·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5页。

②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层……我们都在的时候,楼上就有点挤,但很亲切,我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很亲切”^①。即使远离家乡多年,拉蒂夫对“家”依然有着挥之不去的情感,但为何拉蒂夫从二十几岁远离故土后从未返回?巴林波斯商人侯赛因(Hussein)以合伙做生意为名,用拉蒂夫父亲赖哲卜·舍尔邦·马哈茂德(Rajab Shaaban Mahmud)的房子做抵押,向萨利赫借钱,后来生意失败,侯赛因血本无归,拉蒂夫家的房产债权也因此转移到萨利赫手上。这一行为导致拉蒂夫的父亲以酒度日、母亲频繁出轨、哥哥哈桑(Hassan)被诱骗离家出走、家宅被抵押,这一系列“家”的破裂致使拉蒂夫产生了一种“非家”的情感,“当我回头看的时候,我会发现一些东西仍然散发着强烈的恶意,每一个记忆都在滴血”^②。家园与流散,是一种破碎之苦、离土之痛,也是一种格格不入,一种“居家的无家感”(homelessness at home)。此时,家宅的流动已化为创伤记忆的标志,“没有家宅,人就成了流离失所的存在”^③,家宅已然不具有庇护性质,反而自身也处于危机之中。

另一处家宅是拉蒂夫姑祖母比·玛利亚姆(Bi Maryam)的家宅,是其第一任丈夫纳索尔(Nassor)留下的遗产,纳索尔为防止亲戚争夺财产,因此把家宅留给其妻子,后来玛利亚姆与萨利赫的父亲结婚并成为萨利赫的继母,与懦弱无能的侄子舍尔邦相比,玛利亚姆选择萨利赫成为这所住宅的合法财产继承人。这一结果使舍尔邦气急败坏、恶语相向、到处散播萨利赫夺走其继承权的谣言。多年之后,因此处家宅,萨利赫被舍尔邦诬告伪造玛利亚姆的遗嘱而锒铛入狱,受尽摧残。商人侯赛因的出现使两处家宅联系在一起,从而加重了两家之间的矛盾与仇恨。家宅的流动性和家族纷争密不可分,正如巴什拉所说,家宅具有“一种强大的融合力量,把人的思想、回忆和梦融合在一起”^④。因此,小说中家宅空间的流动性也成为极具表征的家园空间存在,而家宅背后隐藏的是深层的家庭伦理与家族命运。

除家宅外,家宅中的家具也是家园想象的依托。小说中的萨利赫对家具的兴趣浓厚,在父亲去世后,把原来的哈尔瓦店改成家具店,主要向欧洲游客和英国殖民者出售古董和精美的家具,“欧洲人看到好东西就一定要把它们带回家去占为己有”^⑤,欧洲人对家具的癖好与殖民行径如出一辙。萨利赫认为“经商的日子是残酷的,无情的,掠夺性的”^⑥。萨利赫从伦理选择上侧重于西方的立场,重视物质层面,而非情感层面,因此在向商人侯赛因出售精美的乌木小桌子时达成了贷款协议,用舍尔邦的房子和房子里的所有物品抵债,而正是这个协议造成拉蒂夫童年时期家庭的巨大灾难与悲剧,也成为萨利赫成为难民的关键因素。

萨利赫到达英国后,在海边小镇虽有容身之地,却一次又一次地徘徊于家具店,伦敦的家具店让难民萨利赫得到片刻的满足感,唤起与东非故国的联系,在异国他乡体会到“家”的情感,在萨利赫看来:“家具店将我们压在地面上,免得我们爬上树,赤身裸体地在地面嚎叫……也不至于在无路可走的荒野中漫无目的地游荡,在森林里的空地和滴着水的洞穴里面想着怎么吃人”^⑦。小说中的家具店具有丰富的隐喻。一是古尔纳试图嘲讽英国殖民者的“双重使命”,将殖民主义说辞视为一项旨在“驯化”当地人的文明计划,使他们不再赤身裸体地嚎叫,策划同类相食。二是古尔纳暗指难民的处境,家具具有让我们安定的能力,即拥有一个放置家具的空间与无家可归的状态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呼应了萨利赫在小说开头的表述,“我是一名难民,一名寻求庇护者”^⑧。表明“无家可归”是一种流离失所的人生状态,不是一种艺术比喻,而是一种物质条件,这与家具所具有的属性一脉相承。

家宅中的气味也是精神之所的承载。在古尔纳笔下,气味与嗅觉感官成为开启记忆、沟通情感、解读“家”的密码。萨利赫的回忆源于散发“家”气味的沉香木,在斯瓦希里语言里,沉香木叫“ud-al-qamar”,字面意思是“月亮上的木头”。

①Gumah A. *By the Sea*. London: Bloomsbury, 2002, p.82.

②Gumah A. *By the Sea*. London: Bloomsbury, 2002, p.86.

③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6 页。

④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 页。

⑤Gumah A. *By the Sea*. London: Bloomsbury, 2002, p.20.

⑥Gumah A. *By the Sea*. London: Bloomsbury, 2002, p.17.

⑦Gumah A. *By the Sea*. London: Bloomsbury, 2002, p.3.

⑧Gumah A. *By the Sea*. London: Bloomsbury, 2002, p.4.

“过去每一个德尔节,我常常拿着一个香炉在家里面走来走去……它给我和我的家人带来了快乐”^①。气味不仅是一种文化象征,更是流动的,它无处不在,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唤醒情感。小说《海边》第一章的标题“遗物”暗示沉香木具有神圣的价值,其意义超出单纯的经济甚至情感价值。此外,与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交换宗教遗物的方式相同,都是通过沉香木的“购买、赠送和盗窃,从而获得神圣价值”^②。艾莉斯·马利雍·杨(Iris Marion Young)认为“对这些家庭‘文物’的保存成为将今天和昨天编织在一起的一种‘生命叙述’方式”^③。实际上,沉香木来自商人侯赛因,因沉醉于沉香木的诱惑力,萨利赫才答应侯赛因的贷款请求。当抵达盖特威克机场,萨利赫的行李被移民官员凯文·埃德尔曼(Kevin Edelman)打开时,萨利赫解释“那些东西并不代表我的生活,而是一个线索,代表着我想要讲的故事”^④。沉香木是萨利赫移民之前最重要的物品,这个物品被埃德尔曼偷走,象征着叙事连续性的最终断裂,家的印记消逝,从而产生一种“非家”的情感。

这种“非家”的情感体现在“庇护”一词中。自20世纪末以来,英国通过一系列法案建立了现代庇护政策,与此同时,英国是第一批签署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的国家。该公约第三十三条规定:任何缔约国不得以任何方式将难民驱逐或送回(推回)至其生命或者自由因为他的种族、宗教、国籍、参加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而受威胁的领土边界。但如有正当理由认为难民足以危害所在国的安全,或者难民已被确定判决认为犯过特别严重罪行从而构成对该国社会的危险,则该难民不得要求本条规定的利益^⑤。对于寻求避难的群体,避难国不仅要遵守“不推回原则”,而且有义务为难民提供临时居所。萨利赫抵达后的第一个住所就是难民收容所,“我们住的地方原来很可能就是一个仓

库……如今里面装着的是我们,我们没有什么价值,有点讨人嫌,但需要约束起来”^⑥。尽管环境荒凉、自由受限,但与接下来搬去的寄宿公寓相比,收容所至少在情感上提供一些慰藉,与其他寻求庇护者存在一些友情。

寄宿公寓在形式上虽拥有更多的“家”的特质,但实际上是一个令人沮丧的“非家”。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女房东西莉亚的个人物品,这些物品被认为具有身体和精神上的潜在腐败:“床上散发着和楼下沙发套一样的气味,是陈年呕吐物、精液和茶水的混合气息。我都不敢往上面坐,因为我有污染恐惧症,不仅怕会生病,也怕内心被污染”^⑦。西莉亚认为房间里的每一件物品都有意义,但对萨利赫来说,它们只能代表恐怖与堕落。“整个晚上,我一直在回顾西莉亚的宝贵记忆,研究着她旧日的快乐和旧日的遗憾,对它们进行定价和评估,仿佛它们是我在拍卖会上买到的一块地皮的一部分。”^⑧萨利赫将西莉亚的个人物品视为商品,将之降低到纯粹的经济价值以抵制其腐败与堕落。萨利赫对西莉亚物品的解读与乌木桌子和沉香木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获得的叙事价值远远超出了它们作为家庭物品的物质价值。沉香木的唯一替代品是难民同伴阿方索给他的一条偷来的毛巾,它提供的“看不见的地方”是萨利赫躲避污浊环境的唯一避难所。毛巾创造的神圣空间成为在这个陌生和腐败的空间中唯一的锚定点,毛巾被塑造成一种新的遗物——一种因难民生活的短暂性和非人格化而诞生的遗物。

家宅曾是稳固的,人们可以在家宅中安稳地回忆和做梦,而小说《海边》中家宅是偶然的、伤感的、破碎的以及失序的,古尔纳刻画了从“家”到“非家”的流动性景观,构建了一个对于非洲家园的情感寄托与依恋,就如古尔纳《遗弃》中的人物拉希德所说“贯穿光和无家可归经历的深层毒药”^⑨。对这种如离枝落叶般却无根可归的困境,

①Gumah A. *By the Sea*. London: Bloomsbury, 2002, p.14.

②Patrick Geary J. *Living with the Dead in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94.

③Young, Iris Marion. *Intersecting Voices: Dilemmas of Gender,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53.

④Gumah A. *By the Sea*. London: Bloomsbury, 2002, p.8.

⑤国家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国际文书有关宗教条款汇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61—62页。

⑥Gumah A. *By the Sea*. London: Bloomsbury, 2002, p.43.

⑦Gumah A. *By the Sea*. London: Bloomsbury, 2002, p.56.

⑧Gumah A. *By the Sea*. London: Bloomsbury, 2002, p.56.

⑨Gumah, A. *Desertion*. London: Anchor Book, 2005, p.182.

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在其随笔集《想象中的家园》中指出:“一个地道的移民总是会遭受三重破碎之苦——失去自己的身份地位,开始接触一种陌生的语言,发现周围人的社会行为和符码与自己的大相径庭,有时甚至愤怒与不安”^①。然而,对流散最刻骨的体验,不是漂泊,也不是陌生,不是有家归不得的无奈,而是无家可归的绝望。

二 从斯瓦希里沿岸到伦敦的社会空间:非洲家园的流动

《海边》中的两位叙事者都逃离了非洲,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离开非洲家园从而创造了一个流动的家园?其家园的流动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其实可以从萨利赫的身份转变窥见。在《海边》,萨利赫的人生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转折,从阿拉伯商人到政治罪犯再到非洲难民,淋漓尽致地体现了非洲社会的动荡与转变。

萨利赫对地图极为痴迷,“我常常对着地图说话……在地图诞生之前,世界是无边无际的。地图给世界画上了边界,让世界看起来像领土,像是有主的,而不是可以随便瓜分的荒地”^②。这种对地图的着迷源于他在桑给巴尔被殖民时期对童年生活的记忆,当时一名英国教师讲述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横渡大西洋的历史:“他拿了一支白色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幅地图……北非的海岸凹凸曲折,向下溜到好望角……蜿蜒向北……他停在那里,微笑着,用他的粉笔在一条连续的线上画出了半个已知的世界”^③。古尔纳将叙事和制图相联系,引出故事源于非洲海岸线的一个角落——斯瓦希里海岸线。图上的“半个已知世界”并不是哥伦布航行之地,而是他希望向西航行能到达的地方——印度洋。

非洲在印度洋的研究中通常并不可见,处于边缘地带。桑给巴尔的历史主要基于欧洲和其他外部来源,强调海外对斯瓦希里语的影响,而不是非洲本土性^④。古尔纳的写作往往旨在打破对非

洲的刻板印象,把非洲描绘为动态复杂的流动体。“千百年来,英勇无畏的商人和水手每年都会来到大陆东边的这段海岸……他们带来了他们的财富,他们的智慧,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故事……”^⑤从 8 世纪至 15 世纪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控制印度洋贸易的时代,也使东非沿海城邦走向繁荣,期间,一批来自印度洋周边世界、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阿曼人、印度人到东非贸易经商或移民定居。16 世纪初,葡萄牙人入侵东非沿海,掠夺和征服了许多东非斯瓦希里城邦与贸易中心,控制了印度洋贸易。17 世纪中期,阿拉伯半岛强盛起来的阿曼人将葡萄牙人的势力驱逐出整个东非沿海地区,重新确立起了阿拉伯人对东非和印度洋贸易的控制权。到 19 世纪初,控制着印度洋贸易的阿曼苏丹帝国逐渐将政治经济中心从阿拉伯半岛转移到东非沿海,并于 1832 年将首都从马斯喀特(Masikat)迁到桑给巴尔,形成了新的桑给巴尔苏丹国。因其控制着印度洋贸易和东非众多城邦被称为“桑给帝国”,直到 1890 年桑给巴尔被英、德征服,“人们绘制了新的地图,很完整的地图,每一寸土地都不放过,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他们是谁,或者说他们是谁的人。地图改变了一切”^⑥。殖民地图的绘制打破了非洲原有的繁荣景观,“之后的一两年里,到了年底的几个月,街道和空地都是静悄悄的,因为这些人都不来了,我们买不到他们的东西”^⑦。东非沿海与整个非洲大陆一样因为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而面临严重的挑战。东非繁荣与文明的印记消失与罪恶的奴隶贸易有关。非洲奴隶大多来自埃塞俄比亚、苏丹、索马里和马达加斯加,被带到印度、好望角和阿拉伯半岛^⑧,被迫适应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但这些被奴役经历的历史记录很少,因此,非洲的记忆多数不可见。

在英国殖民时期,英国人重视阿拉伯统治集团,从一开始就吸收阿拉伯人进入桑给巴尔保护理事会,并计划地选派阿拉伯人担任殖民地政府的高级官员;通过设立奖学金,选派阿拉伯人到

①Rushdie, Salman. *Imaginary homelands: Essays and criticism* 1981—1991.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2, p.35.

②Gurnah A. *By the Sea*. London: Bloomsbury, 2002, p.14.

③Gurnah A. *By the Sea*. London: Bloomsbury, 2002, p.37.

④Horton, Mark. and John Middleton. *The Swahili: The Social Landscape of a Mercantile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p.1.

⑤Gurnah A. *By the Sea*. London: Bloomsbury, 2002, p.15.

⑥Gurnah A. *By the Sea*. London: Bloomsbury, 2002, p.15.

⑦Gurnah A. *By the Sea*. London: Bloomsbury, 2002, p.16.

⑧Campbell, Gwyn. *The Structure of Slavery in Indian Ocean Africa and Asia*.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2004, p.ix.

英国留学,培养阿拉伯人才;采取高薪聘用办法鼓励阿拉伯人参与政府工作;等等。阿拉伯裔的萨利赫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其接受了完整的殖民教育,“英国人给我们建了学校,也制定了上学的规则……说孩子必须年满6岁才能上学,而超过6岁就不能上学”^①。萨利赫在18岁时获得了英国当局的资助,前往马克雷雷大学(Makerere College)接受英国的教育并获得奖学金,而奖学金的附带条款要求受资助者为英国殖民政府工作3年。因此,1956年,萨利赫一边在财政部任职,一边经营着小生意,因英国人对行政官员经营副业很不放心,尤其是金融方面的副业,后来,在其父亲1958年去世后,开始公开经营家具生意,其顾客主要是欧洲游客和英国殖民者。换句话说,萨利赫早年的人生经历得益于英国殖民者的庇护。英国对桑给巴尔实行“保护”以后,在殖民当局的特殊关照下,阿拉伯人长期控制桑给巴尔土地。地主贵族阶级的社会地位不仅没有改变,反而由于大批阿拉伯人成为政府要员而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20世纪50年代以后,非洲和中东民族的独立运动蓬勃发展,桑给巴尔人们要求独立的呼声也日渐高涨。古尔纳在《海边》中多次提到桑给巴尔的独立年,即1963年。1964年1月桑给巴尔爆发国内革命,人口占少数的阿拉伯裔统治阶层被推翻,人口占多数的非洲土著成立了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而作为阿拉伯裔的萨利赫的处境异常艰难。萨利赫描述了革命后的这段时期:“他们操纵选举,向国际观察员伪造数字,而在此之前,他们只是监禁、强奸、杀害或以其他方式践踏本国公民”^②,这揭示独立后国家的腐败。正如福尔克(Falk)指出的那样,桑给巴尔的政治环境从德意志帝国主义时期,阿曼和阿拉伯统治者的至高无上转变为革命后非洲民族主义占主导地位,非洲民族主义排斥阿曼人和阿拉伯人及其后裔,试图抹去这些异质的民族和文化痕迹,使其公民权利因种族而具有排他性,并继续走殖民时期实行的二元隔离的道路^③。这一行动在《海边》中

有所描述,这些审判和监禁“从独立后的第二天起,政府就把监狱塞满了”^④。

1967年,银行国有化,拉蒂夫的母亲阿莎利用和资源部长谢赫·阿卜杜·哈尔凡(Khalifa)的情人关系构陷萨利赫,被要求全额还清从银行借的贷款。但萨利赫无法短时间还清贷款,于是银行没收了抵押的房子,此时萨利赫和舍尔邦争夺的房子变成了银行的财产。租客被通知立即搬走,房子刚刚腾出来,舍尔邦和阿莎就搬回来了。再过五个月后,萨利赫被叫到党部,事由是舍尔邦告萨利赫伪造了他姑姑的遗嘱,并且死后非法侵占舍尔邦的住所。在听证会中,萨利赫遭受着委员会的轮流斥责,被迫接受骗取他人合法财产的罪名,甚至因此在1968年在党部被捕,在十多年的牢狱生活中,萨利赫的身心遭受折磨,甚至因疟疾险些丧命。

1979年国家大赦,萨利赫终于可以见到妻子和女儿,但不幸的是,他们在萨利赫入狱后的第一年因感染疾病而丧命,这让萨利赫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从某种程度上说,萨利赫在成为跨国难民之前,已成为国内的难民。萨利赫通过公民的持续恐惧来反映独立后事态的进展:“多年来,我一直过着那样的生活,像大家一样贫穷,一样战战兢兢,竖起耳朵,留心我们的统治者最近有什么恶意或者报复行动,尽管在过去十年里我们的状况有所缓解”^⑤。情感的创伤以及独立后的社会腐败正是萨利赫成为难民,逃亡英国的症结所在。

《海边》通过描绘小说中的人物如何受到国家敌对行动的影响以及他们的话语如何被边缘化,反映桑给巴尔独立革命后的事态变化。古尔纳这样评述曾经的去国离家,“在那个充满艰辛和忧虑的年代,国家恐怖主义和蓄意羞辱无处不在,十八岁的我唯一想做的,就是逃离那里”^⑥。福尔克认为“在古尔纳的小说中,非洲民族主义不断受到嘲笑和批评”^⑦。事实上,古尔纳笔下的人物在独立后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通过寻找其他方式来谈归属与认同。斯坦纳(Steiner)指出,桑给

①Gurnah A. *By the Sea*. London: Bloomsbury, 2002, p.35.

②Gurnah A. *By the Sea*. London: Bloomsbury, 2002, p.10.

③Falk, Erik. *Subject and History in Selected Works by Abdulrazak Gurnah*. Karlsta: Karlsta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9.

④Gurnah A. *By the Sea*. London: Bloomsbury, 2002, p.217.

⑤Gurnah A. *By the Sea*. London: Bloomsbury, 2002, p.236.

⑥Gurnah A. "Writing and place", *Wasafiri*, 2004, 19(42):58.

⑦Falk, Erik. *Subject and History in Selected Works by Abdulrazak Gurnah*. Karlsta: Karlsta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30.

巴尔的历史以及独立后的混乱状态“动摇了民族主义的概念”^①,带来了文化关系和与祖国身份的转变,随之而来的逃离或流放与民族主义的排外机制有关。古尔纳的作品主张将东非作为一个更加复杂的空间。非洲不仅是欧洲帝国主义的被动对象,而且绘制了一系列“重叠的跨国矢量(媒介):旧的贸易移民社群、穆斯林网络、奴隶制、英帝国主义的衰落、桑给巴尔独立、冷战、国际难民条例和随之而来的非—阿拉伯暴力”^②。古尔纳的写作加深了对非洲的地方感——非洲东部海岸的景象。

萨利赫和拉蒂夫的抵达之地都选择在英国,对难民而言,逃离故国的主要目的是重建家园,而地理空间的变化只是新家园建构的开始。难民在准入英国之前,首先需要接受移民局的审查。而机场移民官员凯文充满敌意地指责萨勒赫:“你们不是这个地方的人,你们不会珍惜我们所珍惜的任何东西,你们没有经过几代人的付出,我们不希望你留在这里。在这里,你们的日子一定会很艰难,你会承受各种羞辱,甚至会遭受暴力。”^③凯文的话语赤裸裸地体现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古尔纳曾说:“依我看来,帝国主义时代确实还远未结束。帝国主义仍然是令英国人心安和欣慰的世界观。”^④由于英国社会普遍的文化排斥和种族歧视,初到英国的萨利赫为了获得准入资格,不得不采取沉默的策略。他的沉默也反映了“两个文化相比较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文化的软弱”^⑤。家园只是一种建构出来的概念,以物理空间为基础的家园意识将会逐渐让位于对流散身份接受。

三 “夹心人”的心理空间:处所意识与身份焦虑

罗伯特·塔利(Robert T. Tally)在《处所意

识:地方、叙事与空间想象》(*Topophrenia: Place, Narrative, and the Spatial Imagination*)一书中提出处所意识的概念。“处所意识”——topophrenia,是塔利自创的单词,即人们对自己所处地方的意识和关切,这是一种持续、强烈乃至有些夸张的“地方关切”,且往往令人不安,并决定着主体与环境之间互动的特征^⑥。从词源学上说,希腊词根“topo”(place)指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处所”,后缀“phrenia”(mind)有“疾病”“混乱”和“障碍”的意思,暗指不安、不满、不悦等空间焦虑,主要是人对逝去的处所及其所代表的存在方式即“无”的“焦虑”,纵使人在自己特别熟悉的地方(如家中),也会感到无可名状的不安,甚至是恐惧^⑦。这种主体的内在体验与世界之间的张力关系所形成的“家园”,即“自我与环境交互作用的场所”,是理解“生命(Bios)的一个谱系场所”,其相比之于空间更接近存在的本源^⑧。此种“处所意识”与海德格尔所言的“烦”(angst)、萨特所言的“恶心”(nausea)相埒,是一种对生存的“无根性”之焦虑,其使人们陷入某种“无家可归”的状态。

“处所意识”之概念形象地描绘了《海边》中萨利赫初到英国时的处境:“在黑暗中,我失去了空间感,而就在混沌之中,我更切实感觉到了自己的存在,更清晰地听到了各种声音,好像是第一次听到似的”^⑨;“街道让我很紧张,有时候,即使是在公寓里,门窗紧锁,我也无法入睡,常常坐立不安。”^⑩这种焦虑来源于对未知和不确定因素的担忧,而这种担忧成为萨利赫通过回忆绘制家园、家宅、家事等“家”意象背后的动力。当然,处所意识并非仅仅指不愉快的空间体验,也包括段义孚(Yi-Fu Tuan)提出的充满阳光、欢快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和特里格(Dylan Trigg)提出的“地方恐惧”(topophobia)的全部情感效果。

①Steiner, Tina. “Writing Wider Worlds: The Role of Relation in Abdulrazak Gurnah’s Fiction”,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2010, 41(3): 125.

②Hofmeyr, Isabel. “The Complicating Sea: The Indian Ocean as Method”,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2012, 32(3): 589.

③Gurnah A. *By the Sea*. London: Bloomsbury, 2002, p.12.

④苏西拉·纳斯塔:《“不易说清的东西”——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访谈录》,刘子敏译,《世界文学》2022年第2期。

⑤Jones, Nisha. “Abdulrazak Gurnah in Conversation”, *Wasafiri*, 2005, 20(46): 39.

⑥方英:《空间转向之后的存在、写作与批评——评塔利的〈处所意识:地方、叙事与空间想象〉》,《外国文学》2021年第3期。

⑦Tally, Robert T. *Topophrenia: Place, Narrative, and the Spatial Imagin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38-39.

⑧妥建清,张媛:《生存困境与文学空间理论的突围——兼论塔利的文学制图理论》,《文艺理论研究》2023年第4期。

⑨Gurnah A. *By the Sea*. London: Bloomsbury, 2002, p.1.

⑩Gurnah A. *By the Sea*. London: Bloomsbury, 2002, p.3.

方英指出,在塔利看来“在后民族、后现代的全球化时代,处所意识不断加剧,因而需要我们将文学写作看作绘图,以建构想象的整体性,并以地理批评的进路分析文本中的空间性,应对存在状况中的空间焦虑与危机”^①。而在小说《海边》中两位主角兼叙述者所表现的处所意识的缓解通过记忆叙事的形式而得以构建。在重读海德格尔的栖居哲学时,艾莉斯·马利雍·杨(Iris Marion Young)重点关注了他的“保存”(preservation)概念,而这一概念在海德格尔自己的分析中受到的关注有限。艾莉斯认为“保存”并不是“固定身份”(即排除),而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②。萨利赫通过讲述桑给巴尔的殖民与独立革命后个人的境遇来展现个人与历史的交融。

尽管《海边》有两位主角兼叙述者,但小说的主要叙述者是难民萨利赫。小说伊始,萨利赫离开已然熟悉的环境,带着一点乱糟糟的行李,藏着一点秘密和没有一点头绪的野心,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讲述自己的过去,“这件事,我们迟早要做的”^③。小说通过这种方式构建萨利赫的叙述,揭示了一种将移民经历写成小说的过程中自我意识的建构,将移民叙事铭刻在一个更具包容性和集体性的领域。正如我们从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和其他人的作品中知道的那样,身份也是一种故事,是“叙述”一个或多个特定人的话语结构^④。

“处所意识”构成了文学绘图的根本动力,“以地图绘制喻指文学写作,尤其是通过‘叙事’完成的创造性表征,揭示了写作等文学活动乃绘制主体与更宏大的时空整体的关系,并探究文学如何表征并建构这一整体性”^⑤。古尔纳通过与经典文本的互文,有意识地将其作品铭刻在文学传统中,如荷马的《奥德赛》和《天方夜谭》、安东·契诃夫的《小说集》和赫尔曼·梅尔维尔的《书记员巴特尔比》。实际上,古尔纳笔下的人物总是自我流放或被流放,更多的时候是主动地选

择逃离,如同奥德修斯的“归家之旅”,古尔纳2011年出版的《最后的礼物》中男主人公阿巴斯抛弃在非洲的妻子以及未出生的孩子,游历各国,做了十几年的水手,最后才定居英国。除此之外,《海边》与《书记员巴特尔比》的互文不仅体现在语言文字上,还在叙事结构上形成关照,《海边》以房产为核心展开双主体叙事,而《书记员巴特尔比》中律师事务所主营业务正是处理房产纠纷。由此,古尔纳将小说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其叙事生动地反映了历史的纵深感。通过将互文性编织到文本主体中,小说构建了一个跨文化的元叙事,而这样的互文性不仅体现了霍米·巴巴“混杂”的概念,也是对西方经典文本的继承与改写,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欧洲中心主义。

与小说中的主要叙述者萨利赫相比,拉蒂夫的学术地位不同,但也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这是他描述自己的起点,“于是我就大步流星地赶去上班……心里有点焦虑,但不算很过分,脑子里反复浮现出日常的工作、未说出口的遗憾、没干好的事情”^⑥。这种身份焦虑出现在日常生活的瞬间,是一种“习惯性的焦虑”,伴随的是拉蒂夫的不自信与白人的歧视。他在上学的路上被一个穿着厚重昂贵黑色外套的老人侮辱,他称拉蒂夫为“你这个嬉皮笑脸的黑摩尔人”^⑦。这表明了他在成为一名著名诗人和学者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复杂经历和忍受的敌意。身份归属的缺失是这些“夹心人”内心挣扎和焦虑的根本原因。是否有一种设想,即拉蒂夫放弃学习牙医转而从事文学研究,其实也是一种文学绘图行为,从而缓解“处所意识”——“夹心人”的身份。

这种“处所意识”除了体现在《海边》中的两位主人公身上,还反映了古尔纳的人生经历。古尔纳解释之所以写小说是因为“一些以前看似并不复杂的问题触发了我的思考和忧虑,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身处英国之时产生了极为强烈的陌生感和差异感”^⑧。他描述他在桑给巴尔所接受

①方英:《空间转向之后的存在、写作与批评——评塔利的〈处所意识:地方,叙事与空间想象〉》,《外国文学》2021年第3期。

②Young, Iris Marion. *Intersecting Voices: Dilemmas of Gender,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53.

③Gurnah A. *By the Sea*. London: Bloomsbury, 2002, p.1.

④Hall, Stuart.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Cultural Research Reader,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0, p.395.

⑤方英:《文学绘图:文学空间研究与叙事学的重叠地带》,《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

⑥Gurnah A. *By the Sea*. London: Bloomsbury, 2002, p.71.

⑦Gurnah A. *By the Sea*. London: Bloomsbury, 2002, p.72.

⑧Gurnah A. “Writing and place”, *Wasafiri*, 2004, 19(42):58.

的教育的异质性“除了殖民地教育以外,清真寺、古兰经学院、街头巷尾、家中闲谈以及毫无规划的阅读都是我学习的资源”^①。而这些经历让古尔纳意识到“写作始于对边缘性或者差异性的自我认知”^②。一定程度上,古尔纳的写作是身份建构的一部分,是一种关于生命的体验。

结语

古尔纳在《海边》中的“文学绘图”,缓解了萨利赫与拉蒂夫的“处所意识”,并产生深远的文化影响。小说通过书写欧洲、非洲和中东之间全球贸易关系的曲折历史,描绘了桑给巴尔地区现代国家的运动史,包括西方殖民导致的印度洋阿拉伯商贸帝国的衰败、桑给巴尔独立革命的影响以

及社会主义东德对于坦桑尼亚现代化道路的影响,打破了非洲的刻板印象,反思了现代民族国家运动史。正如蒋晖所说:“古尔纳终结了非洲的‘后殖民写作’,因为他改变了‘想象非洲’的根本方法:非洲的内涵并不能在非洲得到,它是阿拉伯世界、亚洲和西方文明的混合生成之物。”^③《海边》中的两位叙述者的主要身份是来自“他乡”的难民,他们很难融入英国社会,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内心充满焦虑与不安,这种“处所意识”和“身份焦虑”在两人相遇后故事的讲述中有所缓解,两人的口头叙述不仅折射出欧洲普遍存在对“他者”的文化排斥,也揭示了文化与地缘裂隙间的“夹心人”的命运与境遇。

Topophobia and Home Space Mobility: Taking Gurnah's *By the Sea* as an Example

LI Mengmeng & WU Ling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By the Sea* is the masterpiece of Gurnah who is the winner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2021. It takes the life experiences of Saleh Omar and Latif Mahmud as clues to make a double narrative, involving a number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ns, especially the home space mobility. The depictions of physical spaces, such as homes and shelters, show Gurnah's complex feelings about “home” and “homecoming”, emphasizing the aesthetic value of “home” for displaced “marginal people”. Gurnah reflects th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f Africa through the dynamic description of Zanzibar history, so as to break the stereotype of Africa and reflect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nation-state movement. The portrayal of Eurocentrism prevalent in British society aims to indicate the psychospatial experience of diaspora groups in immigrant countries. With the help of the dual narrative of the two characters, Gurnah not only reflects the widespread cultural exclusion of the “Other” in Europe, but also shows the “Topophobia” and “Identity Anxiety” of strangers, revealing the fate and situation of the “marginal people” between culture and geography.

Key words: Gurnah; *By the Sea*; home space mobility; Topophobia

(责任校对 葛丽萍)

①Gurnah A. “Writing and place”, *Wasafiri*, 2004, 19(42):60.

②Gurnah A. “Writing and place”, *Wasafiri*, 2004, 19(42):60.

③蒋晖:《从“后殖民”到“后文明”——古尔纳《海边》中的世界主义》,《外国文学研究》2022年第2期。